

APARP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Paper No. 58 Sept. 2002

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

張存武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王國璋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



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中央研究院 亞太研究計畫

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APARP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Paper No. 58 Sept. 2002

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

張存武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王國璋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

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

張存武 王國璋

摘要

1954 年成立的菲華商聯總會總被譽為全球華人組織中最有權力效能者。研究該會實際上是對菲華整體的瞭解工作。例如自其淵源可知菲華是以商人為主體，其前身可上溯至西班牙統治時期的甲必丹（Captain），而其維護菲華安全、利益的職責乃承自小呂宋中華商會，不過其權力基礎遠大於該會，乃全菲華商會選出者，自其組織內容可以瞭解菲華社會的精英，自其功能可窺見該會與菲律賓政府的溝通，與中國政黨、政府的關係，與菲華大眾的互動。其組織架構及領袖群的變動反映了派系利益衝突及新舊世代的變遷。全球海華自治組織的目的大致相若，故此種研究可擴大推展。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Inc.: 1954~1998

Tsun-Wu Chang and Kok-Chung Ong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Inc. is the most powerful one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 study of this Federation completed in the year of 2000 has proven such view. The fact that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are merchants, a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Federation was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the organization powerful. From the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Federation has kept complex relations with both the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Federation over the years also reflected the power struggles and interest conflicts amo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Filipinos in Manila.

目 錄

摘 要

前 言	1
-----------	---

壹、緒論	2
------------	---

一、菲華研究回顧	2
----------------	---

岷里拉中華商會與商總研究回顧	8
----------------------	---

二、本文重點	11
--------------	----

貳、商總創立前菲華安全及利益的維護	13
-------------------------	----

一、菲華移民社會安全與利益的維護	13
------------------------	----

(一) 西人的五次屠華事件	14
---------------------	----

(二) 甲必丹制度與菲華內部的自我管理	15
---------------------------	----

二、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	17
--------------------	----

(一) 岷里拉中華商會的成立及其名稱演變	17
----------------------------	----

(二) 商會的組織	18
-----------------	----

(三) 領導層之變遷	19
------------------	----

(四) 西文簿記案的抗爭	21
--------------------	----

(五) 協助中國駐菲總領事館辦理僑民至菲避難交涉	23
--------------------------------	----

參、二次戰後的世變與商總之創立	24
-----------------------	----

一、日據與二次戰後初期的菲華社會境況	24
--------------------------	----

(一) 日據及光復初期商會領導層中的一些變化	25
------------------------------	----

(二) 光復初期的菲華商業復興	26
-----------------------	----

(三) 移民問題的持續困擾	27
---------------------	----

二、禁僑案與菲化浪潮下的岷里拉中華商會	28
---------------------------	----

(一) 禁僑案及其震撼	28
-------------------	----

(二) 菲化案的嚴重打擊	30
--------------------	----

三、商總的醞釀與成立	32
------------------	----

(一) 王國來的倡議與行動	34
---------------------	----

(二) 爭取楊啟泰、姚迺崑和林為白的支持	35
----------------------------	----

(三) 「灣景」會議	36
------------------	----

(四) 商聯的成立與擴大	37
--------------------	----

(五) 商聯與商會的「團結談判」	38
------------------------	----

陸、結論	94
一、四十四年來商總功能角色的變與不變	94
二、商總與東南亞其他華人商總會之比較	96
三、未來發展展望	97
附錄：商總歷年大事紀	98
參考文獻	101

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

張存武 王國璋

前言

進行菲律賓華僑華人口述史訪問期間，曾去馬尼拉若干次，結交了一些好朋友，也對菲華社會組織有所瞭解。而自寫畢〈菲律賓華人社團與文化活動〉（張存武 1994）及〈菲華商聯總會之成立與演變〉（張存武 1995）後，深覺該會有進一步考察認識之必要與價值。菲華商聯總會成立於1954年，至今已近半個世紀；而其前身——岷里拉（馬尼拉）中華商會更是早自1904年就已創立，至1954年領導地位為菲華商聯總會取代時為止，也已歷半個世紀。換句話說，菲華商聯總會之歷史淵源堪稱久遠，所累積的經驗閱歷也是十分的豐富。而作為菲華社會形式上並實質上的最高領導機構，它不僅集菲華商界菁英於一身，多年來更被譽為全球華人社團中最有影響力者之一。因此我深信，如欲深入瞭解近代以來的菲華社會發展，選擇以菲華商聯總會的研究作為切入之點，無疑會是一個有效及關鍵的開始。

本研究自1996年開始，除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負責人蕭新煌及近代史研究所兩任所長陳三井、呂芳上之照顧外，曾蒙外交部檔案處、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惠允利用其所藏檔案，謹表謝忱。兩次去馬尼拉蒐集資料，蒙商總秘書長董永洲，副秘書長陳志航等惠助；中華民國政府駐菲文經協會公使林森次及夫人熱心關照，數次代邀、介紹僑界名流相識，從而得以訪問他們。中正學院院長施安娜代覓文件，華裔青年聯合會會長洪玉華教授，及抗日游擊隊第六六九團戰士許錦輝和以前一樣，隨時垂助。第一次訪問馬尼拉由隋皓珣先生助理一切，第二次代以本書協同著作人王國璋先生。國璋因係馬來西亞留台僑生，懂得閩南語，所以襄助之功頗大，而本文的起草工作他也盡了最大的努力，謹此說明，並表謝忱。

壹、緒論

一、菲華研究回顧

由於近百多年來之華人移民及再移民現象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及北美、澳洲地區，因此有關海華之研究多聚焦於這些地域就不足為奇。惟因菲華不論就其與菲先住民的人口相對比例或絕對人數而言，在各主要東南亞國家中都算偏低，¹ 所以學者對菲華之研究熱度遠不及對馬華、新華及印尼華僑華人或華族者，也是事實。以下筆者針對該領域與本研究主題較相關的三部份研究成果作一粗略回顧：即首先作一鳥瞰式、整體性的菲華或中菲關係歷史研究回顧；其次檢視多年來研究者著墨頗多的有關菲華各項認同／融合議題之討論（尤其是政治認同）；最後才觸及近年來頗為昌盛的，針對菲華各社團、組織之研究成果。

提到整體性的菲華或中菲關係歷史研究，陳荊和、Edgar B. Wickberg、Antonio S. Tan（陳守國）、陳烈甫、劉芝田、陳台民與蕭曦清諸人的成果都值得一談。首先，想要了解早期中國人在菲活動的歷史，除中國古籍裡的零星記載外，研究者勢必仍需仰賴於西班牙文資料之研讀；而大多數論及西治至美治初期菲律賓群島歷史情況的作品（包括各種時人之遊記見聞撰著），都不免提到華人在該殖民地的活動和角色。陳荊和於六十年代出版的《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1963），是極難得探討華人在菲初期境況的嚴謹中文著作；而 Alfonso Felix Jr. 所輯之上、下兩冊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vol.1) & 1770-1898 (vol.2)* 論文集（Felix 1966 & 1969），對該時期的菲華研究亦極具參考價值。不過若論作品之原創性，當推 Edgar Wickberg 根據菲律賓國家檔案館內的西班牙原始文件，於 1965 年撰述成書的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Wickberg 1965）。這位出身柏克萊加大的歷史學家認為，十九世紀下半葉乃是菲律賓現代社、經架構成形的時期，而菲華經濟強勢地位之建立，也恰在其時。西人在經過數百年來既依賴華人提供的生產、貿易服務，又時時猜懼其壯大滋事的心理、政策

¹ 菲華人口至八十年代末一般估計約為 60 萬~100 萬人。這種數據上的不確定性，與缺乏官方對其華裔公民的人口統計資料有關——一般而言，菲華既已入籍，即不另分類。然而即使就 100 萬人口來說，在當時，這也還不及菲律賓 5 千 5 百萬總人口的 2 %（Wickberg 1990：24）。若與泰華佔泰國人口的 9-10 %、馬華佔馬來西亞人口的 30-32%、新華佔新加坡人口的 75-77% 以及印華佔印尼人口的 3-4 % 相比，不論就相對比例或絕對人數言都遠遠不及。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個 100 萬人指的僅是那些本身還自認為是華人，且仍於日常生活中踐行一般華人之行為模式與習俗觀念的人。事實上，菲律賓社會中的華菲混血兒（即所謂的 Chinese Mestizo）為數眾多，著名的菲華歷史學家陳守國就曾指出，至十九世紀末時，華菲混血兒即已達 50 萬人之多（Tan 1994：5），而至今體內尚流有部分華裔血統之菲人，則應已近人口中的兩成。然而這些人中知曉本身有華人血統、或願公開承認其華人血統者，為數頗少，故一般也不被視為「菲華」。關於華菲混血兒種種，下文將再論及。

搖擺後，於十九世紀中期始終於放手讓華人自由遊走群島各地，積極扮演收購內地住民農林產品以助出口及推售歐人消費製品的中間人角色。「華人貿易網絡」於焉成形，並於隨後美殖民政權自由貿易哲學的庇蔭下，進一步得到拓展鞏固。而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菲華仍於菲律賓貿易界中據有非常舉足輕重的地位。Wickberg 之研究也首先點出了一個有趣的心得，即華菲混血兒其時已明顯傾向與當地菲人認同，而反過來當地菲人也早無窒礙地將他們視為自家人。有關這方面現象的進一步探索，後來就由同樣出身柏克萊加大的陳守國廣續了下來。²

事實上，陳守國所廣續的並不僅如此。他所接續的，其實是 Wickberg 的西治後期菲華歷史研究完成後，遺留下來的另一段空白——美治時期之菲華研究。只不過陳氏偏重的，是較為政治面向的菲華民族意識覺醒探討。陳氏本於其博士論文的重要著作，*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 於七十年代初發表（Tan 1972），點出所謂菲華社群的一體感，實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有關。他認為在民族主義一詞尚未出現於中國人語彙裡的廿世紀前，儘管存在對僑鄉情感與文化上的牽繫，菲華眼中的「中國」，實不具民族國家上的意義。換句話說，他們的忠誠，僅僅不過表現在文化的意識上。然而邁入廿世紀後，民族主義意識逐漸在海華社群間滋長，菲華自不例外，也因此亦愈與中國的脈動相結合。而另一方面，陳氏也試圖釐清美、西兩殖民政權對菲律賓華民政策的不同之處，及其對菲華民族與政治意識覺醒之影響。該書之後，陳守國於八十年代初再完成了一本關於 1942~1945 年日侵期間的菲華研究著作，並聚焦於菲華抗日運動之探討（Tan 1981）。惟或因原始資料不足，較之前書，就顯得不夠深入。不過陳守國同時期另一篇探討華菲混血兒與菲律賓主流社會互動之論文，*The Chinese Mestizo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ilipino Nationality*（Tan 1994），卻引起相當迴響，或因其有助營造族群融合氣氛之主題而於 1984 年由作者任教的菲大亞洲研究中心以油印本發行，隨後又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之收錄在一本文集中。這篇論文揭櫫了華菲混血兒及其後裔在菲律賓近代史歷程中的重要影響——包括他們對菲律賓革命的參與；而這種普遍被視為「有助族群融合」之主題，於 1988 年陳氏猝然逝世後，仍不斷經「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Kaisa Para Sa Kaunlaran）提出來加以探討，容後再論。

陳烈甫於六十年代末起陸續透過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的百萬言菲律賓研究系

² 陳守國即王慶武所謂二次戰後崛起的新一代本土華裔學者之典型。他成長於菲律賓，取得獎學金赴美留學前，乃在當地著名的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及菲律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完成學士及碩士課程，對所欲研究的菲華相關主題，自可能較外籍學者有更多的深刻體會。惜陳氏早逝（1988 年據聞為入屋行竊之竊賊所殺），無法進一步在這個領域發揮。

列，³ 是另一非常值得一提的相關著作。陳氏曾任廈門大學政治系主任及廈門市議會議長，大陸失守後滯菲，後主持宿務（Cebu）東方學院（即前之中國中學、東方中學）校務卅多年，對於菲律賓的歷史國情與中菲關係發展，皆有相當坦率敏銳的見解觀察。其行文雖較近新聞式評論而不以嚴謹的學術寫作規格為之，但觸及之面向既深且廣，每有卓見，幾乎把戰後至其寫作期間所有有關菲華社會的重要事件都涵括到了。諸如四十年代末死灰復燃的萊市菲化案，五十年代初期的大逮捕與禁僑案、逾期遊客案、洪祖鈞劫機事件、零售業菲化案以及稍後的華校菲化爭議等，雖都曾對菲華社會造成不小衝擊，但西方學者往往卻礙於無法接觸、閱讀第一手中文資料而不能精確掌握其脈動，或甚至忽略其重要影響而整個的予以略過不提。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陳烈甫各書中所謂之「中菲關係」實多僅限於四十年代末國府撤退來台後與菲政府間的互動探討，若論戰前以至歷史長河裡久遠之中菲關係概述，劉芝田的《中菲關係史》（1964）出版至今雖已逾卅年，仍不失其價值。劉氏此書材料蒐集豐富，上自菲島史前期的中菲兩地間淵源，下迄 1960 年代初馬卡巴噶總統（Diosdado Macapagal）任內，就處理的時間範圍來說算得上十分周遍，就參酌的資料言亦能中西兼顧、多方引證；對一位非逸養於學院中的老資格報人及華校校長來說，這已屬難得。至於與劉書在寫作主題、寫作時間及處理架構上都近似的，還有陳台民的《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1985）。陳氏是於 1958 年起陸續撰寫該主題文章在菲《華僑商報》連載，氣魄也很大，原計畫從中國唐宋與南洋諸島嶼間的交通談起，分撰十冊，直寫至日本佔領菲島時期為止。惜作者因故未能如願，只論及西人對華民進行第一次大屠殺的第二冊而已。無論如何，陳氏之用心並不遜於劉芝田，其唯物史觀式的看法也較為突出鮮明。尤其該書更是大量引用了西人方面的史籍文獻、報告、信函與敕令等，部份內容雖流於繁瑣重複，仍不失引介之功。簡言之，陳烈甫、劉芝田與陳台民三人的上述著作，就嚴格學術標準來作衡量雖不免都帶著些「業餘」色彩，但因本身即身處於二戰前後菲華社會急遽變動轉型之時代，感受深切，雖曰「中菲關係」研究，著墨焦點仍多在菲律賓華僑／華人社會，陳烈甫與劉芝田尤其鉅細靡遺地記錄了二戰結束後十幾廿年間發生於該社群內部的大小事件。大逮捕和禁僑案為菲華社會帶來巨大的心靈震撼，而零售業菲化案則幾已影響到了這個社群裡每一位成員之生計——一種深沉的不安全感與焦慮，遂塞塞乎社群內部。而正是在這種氛圍籠罩著的壓力底下，才促成了菲華商聯總會之誕生。對於這樣一項背景的理解，陳、劉二氏的相關撰著顯然仍較其他英文文獻提供了更大的幫助。

³ 這六本專著分別是 1.《菲律賓的民族文化與華僑同化問題》（1968a）、2.《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1968b）、3.《菲律賓的資源經濟與菲化政策》（1969a）、4.《菲律賓民治制度的理論與實際》（1969b）、5.《虎克騷亂與社會改革》（1971）以及 6.《菲律賓對外關係》（1974）。其中第二、第四及第五本曾分別獲得菲律賓中正文化獎、嘉新優良著作獎及中山學術文化獎。

至於出身中華民國外交領事人員且曾駐菲的蕭曦清，1975 年亦曾將其畢業於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的國際關係博士論文 *Chinese-Philippine Diplomatic Relations, 1946-1975* 在馬尼拉付梓，迨九十年代初復將之加以擴充後寫成中文本的《中菲外交關係史》一書（蕭曦清 1995）。蕭氏因其本身職務上的便利，得覽不少第一手的外交資料，包括菲外交部圖書檔案館所保存的各項原始文件、報告與紀錄等，所述所據自較真實可靠；且涵蓋週遍，兼顧了菲律賓承認中共前後與兩岸間的各別關係發展，而不再僅限於中華民國。惟該書重事實之鋪陳而少議論，這一點若較之陳烈甫等人的著作，就顯得不足。

關於探討菲華各項認同／融合議題——尤其是政治認同之文獻，近年來已成為菲島相關華裔學者的主要關切。其中陳守國、施振民與洪玉華夫婦（Chinben See & Teresita Ang See）之研究成果，以及洪玉華領導下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多年來之系列出版品，都頗值得注意。不過西方學者在這方面亦饒富興致，Garald A. McBeath、Robert O. Tilman 及 Jacques Amyot 的相關著作亦須在此一提。

McBeath 曾在其七十年代出版的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1973）一書中指出，菲律賓的大多數華裔青年，很大程度上依然維繫著其華人認同或其「中國性」；然而另一方面，Tilman 的同時期研究（1970 & 1972）卻得出不同結論，認為菲華中的年輕一代大多實已「褪中國化」（desinicized）。⁴ 這種歧異觀點的出現，主要或與研究者觀察的地域不同有關。McBeath 之研究乃奠基於大馬尼拉地區的非華青年，而 Tilman 則是在群島中部的宿務市（Cebu）進行。大馬尼拉地區由於仍是全菲最重要、最密集的華人聚居地，華人影響猶盛；而宿務一帶的華人，則因人口較為散疏而與當地菲人有更頻密的互動接觸，兩者身處的社會情境顯然並不相同。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新一代菲華蛻變的幅度已是相當可觀，雖與當地文化上的融合不若爪哇的 *Peranakan* 或馬來亞半島上的 *Baba* 般深化，但從日常生活種種，尤其是宗教喪葬習俗方面的兼容並蓄⁵，已可窺端倪，以致於 Amyot 這位耶穌會教士出身的學者，已開始在展望菲華將發展出獨特的另一種新文化（Amyot 1972）。不過，三十年代以來自中國抗戰及內戰接連發生後，大批合法／非法難民或新移民的進入，對原已漸趨自我定型的菲華社會帶來的影響頗為深遠，此不僅反映在人口的組成上，亦在社群文化與血緣上的再

⁴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Tilman 同時也在其研究中指出，菲華青年雖多已「去中國化」，但還談不上「菲化」。

⁵ 菲華在這方面較顯著的宗教實踐，包括將天主教的聖徒、聖母以華人傳統方式加以膜拜，或甚至將前者與中國神祇一同擺放在寺廟神壇上接受供奉。而距馬尼拉南部一百多公里的 *Batangas* 市內之媽祖天后宮廟，竟還供奉著一座全然天主教服飾裝扮的媽祖神像。此外，有趣的是，菲華辦事一般仍重日子的吉凶或生辰八字，買地造房蓋廠也要看風水，但孩子必須進教堂受洗，結婚儀式則選擇在教堂由天主教神父主持。而新廈落成開張除燒香獻祭外，亦多找天主教神父撒聖水祝福一番。

回溯。⁶遺憾的是，西方學者之筆多不及此。

施振民、洪玉華夫婦與陳守國同是近年來重要的菲華研究學者，而施振民夫婦尤其身體力行，將他們鼓吹菲華認同、融入菲律賓大社會的理念，落實到現實生活的推動當中。1970年施振民主導發起的「合一協進會」(Pagkakaisa Sa Pag-unlad)，以及施氏因肝癌逝世後，洪玉華於1987年與吳文煥等人共同組織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就是前述實踐理念下的產物。由於四歲即自福建來菲，在宿務成長，治人類學的施振民對於當代菲華在文化與政治認同上的曖昧與徬徨，有著深刻的理解。有關他在這方面的中、英文系列精闢文章，1992年由其妻彙編出版的《華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洪玉華 1992)均予收錄，當為一咀嚼其思考歷程的方便文集。施氏常認為，直至其撰文的七、八十年代為止，菲華社會仍為那些在中國出生、心繫中國命運的老一輩掌舵者所主導，而這些人直到當時，依然遲疑地不敢認真跨入那個他們視為充滿敵意的外世界。此或唯有待未來世代之交替，加以更易了。回過頭看商總的情形，商總歷屆領導人中確多出生中國者，且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菲華大批入菲籍後，仍不免抱著「僑團」的經營心態。此固囿於獨特時空環境之限制，恐也是造成年輕一輩漸與商總疏離的因素之一。惟九十年代以降，商總內部完全本土背景的領導菁英漸多，而這種變化對其未來與兩岸政府間的互動究竟會造成何種影響，值得觀察。

洪玉華在丈夫施振民逝世後，近年頗有繼其志業的氣慨，與施氏生前好友吳文煥等人透過華裔青年聯合會，致力於菲華各項當代議題之探討。她於1990年出版、1997年增補為兩冊的*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See 1997)一書，主要乃取材自本身在拉剎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的授課內容，除融合的主題外，更試圖極力向菲律賓大社會強調菲華乃「資產」而非「負擔」。洪女士此外亦有相關論文多篇，目前儼然已是菲律賓國內菲華研究的代言人。

關於針對菲華各社團、組織之研究成果，近年來頗有昌盛的勢頭，此尤以中國大陸華僑／華人學界為然。除因社團、組織研析對初涉菲華研究的學者來說往往較易入手外，這顯然也與Wickberg和施振民都早已注意到的、菲華社團近數十年來不衰反盛的「異常」蓬勃現象有關。施振民的〈菲律賓華人文化的特續——

⁶ 中日戰爭發生後，菲律賓總統奎松(Manuel L. Quezon)本乎人道精神，特准五千多名華人以難民身份移居菲島，其中大多數為菲華眷屬。婦女的增加糾正了以往不平衡的性別比例，也才因而造就往後菲華人口的自然增長。此外，這些新移民中還包括不少避亂的知識份子，遂亦為菲華社會輸入新一輪的文化影響(轉引自施振民 1976: 127)。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難民浪潮一度難以為繼，惟戰後數年間，另一波約五千多名的菲華眷屬子弟等又以「遊客」及「學生」身份來菲，隨後因大陸赤化無法返鄉而在此居留下來，是為所謂的「逾期遊客」。此後菲華社會在與本鄉的文化互動傳承上又陷孤立，一直要到七、八十年代港、台與大陸新移民再度湧現後，才又出現微妙的變化。

宗親與同鄉組織在海外的演變》(1976)及 Wickberg 的 *Notes on Some Contemporar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Manila Chinese Society* (1992) 二文,⁷ 對此都曾作過精要分析。前已提到菲華人口不論就其絕對數量或與當地先住民的相對比例言,在東南亞諸國中乃泰陪末座者,然而其各類社團、組織一般估計就有一千個左右,環顧海外諸華社,菲華高度組織之盛況恐難有匹敵者。⁸ 這裡衍生的兩項有趣問題是:菲華社團為何特多?又為何至今持續增生不已?在外環境不利的條件下,這種活力與持續未免讓人感到好奇。施振民首先強調外在環境對菲華政、經甚至文化領域的強大壓力造成之反彈,以致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華民國駐菲大使館的翼助下,各社團逐漸統合在以商總為龍頭的所謂「五大僑團」領導機構體制內,即(1)商總(菲華商聯總會);(2)文總(國民黨文化協會總會);⁹ (3)反總(菲華反共抗俄總會);(4)宗聯(菲華各宗親會聯合會);以及(5)校總(菲律賓華僑學校聯合會)。¹⁰ 以上各團體每一類均有其個別功能,只有宗親會、同鄉會和結義組織是以「聯絡感情、共謀福利」為主旨自然結合的自願團體。¹¹ 而從五十年代後期起數目急遽增加的,主要正是這一類型的組織。施氏認為商總的形成乃冀求在政治層面上集中力量與資源,而宗親與同鄉組織的出現基本上則起於文化層面的調適,由此產生的內衍(involution)現象則表現在這類團體的增多和複雜化上(施振民 1976:185)。更多團體的出現並不就意味著菲華社會組織已日益健全壯大,只是由於外部壓力一再緊迫,引起內部不穩促成內衍調適。這種發展有助吸納更多社會上竄升的新富人物及有進取雄心的後起之秀,無形中減少競爭衝突而維持了內在的安定平衡。同時也由於更多的人得以參與,形成更為壯大的華社陣容,造就安全氣氛以抵銷由文化危機引發的虛空和恐懼(前引書:186)。延續施氏的觀察,Wickberg 稍後對菲華社團的演變也提出了數點補充,其中包括指出許多傳統社團並沒有如施氏所預期的,隨著第一代移民的老去與華人文化的式微而凋零。其原因,除上述團體的社會功能——如有助商業及互助活

⁷ 事實上 Wickberg 此文不過是其近期研究計畫 *Organizations and Ethnicity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ince 1946* 進行中的一份期中報告,至於該計畫完成後於何處發表,筆者則仍不詳。

⁸ 1975 年前,由於中華民國駐菲大使館及僑務委員會之紀錄只限於正式登記立案的較大團體,而菲律賓政府方面的資料則更加缺乏(當時大部份菲華團體都沒有向菲律賓政府登記),所以這一類團體的確切總數並不詳。不過吳元黎、吳春熙合著之《海外華人与東南亞的經濟發展》一書中曾經列表統計,菲華社團截至 1973 年止多達 1,060 個,僅次於馬華的 1,655 個,而居第三位的新華則只有 617 個;惟若就華人口與社團的比例言,菲華當年約每五百多人中就擁有一個,遠密於馬華及新華約兩千多人中才擁有一個的情況(吳元黎、吳春熙 1985:159,167)。

⁹ 即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為適應環境於 1970 年改易此名。目前則稱為「文經總會」。

¹⁰ 根據菲律賓的 1972 年憲法,華校在 1975 年後被迫全部菲化,校總遂於 1975 年 4 月宣告解散,但目前則有一功能類似的「校聯」組織。

¹¹ 菲華社會中的結義組織主要又可分三類:第一小類即所謂的「秘密會黨」,如洪門進步黨和秉公社,為幫會式組織。第二小類多是由一小撮結拜兄弟為核心擴大而成的團體,如桃園堂,形式與第一類型近似,惟不屬幫派。第三小類則是以華校同班畢業同學關係為基礎,演變而成的聯誼會和摯友會(施振民 1976:174,177)。

動之進行——仍未完全失效外，¹² 主要顯然還與七十年代後復源源湧入的大陸非法移民有關（Wickberg 1992：48-50）。

這些絕大多數來自閩南原鄉的大陸新移民對菲華社會發展的影響，近年來很自然地經已開始引起大陸華僑／華人研究學者的關注，其中廈門大學陳衍德的《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1998）一書對此即多有著墨。而同樣任教於廈門大學的宋平之《承繼與嬗變：當代菲律賓華人社團比較研究》（1995），則為探討菲華社團的近著。該書雖對於新型社團方面（如菲華防火會及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力補前人研析之不足，且觸及了菲華社團演化與菲華社會中國／本土認同轉向間的有機連結，惜卻未對前述新移民可能為菲華社團帶來的影響作進一步之探討。事實上，1975 年中（共）菲建交後對菲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所帶來的衝擊、對文經總會（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及其他親國民黨社團之打擊，以及因左、右之辨而引發的傳統社團內部意氣之爭甚至另起爐灶現象，至今仍有餘波；而近年來為數可觀的大陸及少數台、港非法／合法新移民的進入，對此恐亦不無推波助瀾之效。兩岸政府近年各自試圖拉攏或維繫對商總領導層影響力的靜默角力，即為此複雜現象之一例。而中共對菲華傳統社團（尤其是宗親與同鄉組織）表現出來的積極善意，除血緣文化情感外，更不無政、經方面之盤算。凡此種種，對尚處於「認同轉型期」的菲華社會來說，恐怕還是值得我們去深入加以觀察的。

岷里拉中華商會與商總研究回顧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之成立遠在商總之前（1904 年），1954 年商總成立後雖猶不願繫屬其下而並存迄今，但依其功能，基本上仍可視為商總組織的前身。本小節即側重回顧與岷里拉中華商會及商總研究相關之文獻。

菲華各社團本身豐富的各類紀念刊、專刊及其他出版品常因「價值有限」的認知而為學院派學者所忽略，事實上這些刊物往往彙集不少該團體甚至當時時空背景下的第一手歷史及觀察資料，且負責編纂者多為大陸南來並熟悉當地情況的

¹² 這一點施振民其實也早有觀察：「商總再也不是處理一切華人事務的岷里拉中華商會，而是全力對付外來壓力和處理整個華人社會事務的總機構，換言之，已不是一般華人隨時可以接觸到的團體。次一級的同業公會只限於處理該行業有關事務，為名符其實的商會，小商人尤其難於憑行會的關係來應付其他方面的需要。宗親會此時由於人口增加而擴大，組織複雜而權力也逐漸集中在少數強有力的領袖手中，普通會員無法保證必要時可以得到宗親會無條件的支持。客觀環境的改變造成華人企求安全感的迫切需要，然而華人社會的團體組織卻無法給予一般小商人滿足這種需求（指五十年代前期之情形）…同時，由於輕工業的興起和華人商場的新繁榮造成一批新富，他們既不可能一躍而就地躋身商總這種大團體，或是在較大的宗親會中成為領袖人物，只有退而求其次以小團體為進身之階…。」（施振民 1976：180-181）故傳統形式之小型組織如同鄉會及結義團體，因仍具擴大個人社會關係、商業網絡與互助的貼切功能，而仍為一般中小規模商人所需。

文人，文采並不遜色。作為菲華領導機構的岷里拉中華商會與商總之紀念專刊，尤其如此。譬如為紀念商總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菲華年鑑》就強調其編輯「取材以商總會務、華僑現狀為經，菲國地、文、政、教、經建活動為緯」（蔡光曼、黃世耀編 1965：1），除詳盡記載了從菲華社會醞釀組織全菲最高機構至商總第五屆代表大會的經過外，還有周遍的菲律賓概況簡介及另請專人撰述的有關菲華教育、新聞事業、婦女運動、社團和中菲關係等之專文。而商總此後出版的二十週年紀念特刊及紅寶石禧紀念特刊等（商總二十週年紀念刊編委會 1974；朱炳泉編 1994），亦富史料價值。另外十分值得一提的還有早年寧明黃曉滄為岷里拉中華商會編的《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週年紀念刊》（1936）。該刊體例誠為菲華各社團紀念刊之創舉，編纂之初原就有將它成就為一本「菲華百科全書」的企圖，歷時四載，編者三易其人。前述《菲華年鑑》之編輯方向，顯就有受其影響。

岷里拉中華商會與商總研究文獻的另一重要來源，為未出版的各校相關博、碩士論文。國內者如當年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陳福壽、邵世光的碩士論文《菲華商聯總會之研究》（1980）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菲華商總之比較研究》（1981）；菲律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則有 David Climacosa 的碩士論文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Its Contribution in Meeting Philippine Socio-Civic Needs, 1954-1980*（Climacosa 1981）及張素玉（Theresa Chong Cariño）的博士論文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54-1994)*（Cariño 1995）。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1970 年亦曾有過一冊由 James R. Blaker 撰述的相關博士論文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Power and Change*（Blaker 1970），而 1994 年底甫畢業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王國柱（Wong Kwok-chu）所撰博士論文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Economy, 1898-1941: A Study of Their Business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Wong 1994），則為瞭解岷里拉中華商會歷屆諸領導人背景的重要近著。上述論文中傑出者不多，其中 Climacosa 所撰尤其淪為二手資料的堆砌。以下僅就 Blaker 及張素玉二氏的論著略作回顧。

Blaker 一開始即歸納出海華研究領域的數項普遍假設以供檢驗，分別是：（1）海華社群的內聚力愈強，則社群所能運用揮舞的權力空間也愈大。（2）海華社群的內聚力愈強，則親中國的政治傾向亦愈明顯。（3）海華社群親中國的政治傾向愈明顯，則愈傾其能為中國的利益奉獻。（4）海華社群愈傾其能為中國的目標服務，則對居住國政經結構之完整性造成的危脅也愈大。這裡有三項互相牽動的因素值得注意，即內聚力、政治忠誠度與經濟力量的強弱，而這些因素往往正是海華敵人疑懼與招人敏感的基礎。

Blaker 起初曾試圖採用性向檢視技巧 (attitudinal survey techniques) 檢視受訪者對重要問題的一些基本態度。惟因事涉政治傾向及個人活動，受訪者閃躲的不合作態度造成結果十分不理想，遂退而求其次，只好將政治傾向與社群內聚力的度量，侷限於相關重要團體活動力與影響力的具體觀察上。換句話說，其觀察前提遂轉變為：一、視岷里拉中華商會或其後繼之商總「壯大」時，為社群本身亦同處於凝聚力強的高峰時期。¹³ 二、視在菲的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於社群內部影響力之提升及社群對中國經濟援助的增加，為親中國政治傾向之增強。

有趣的是，Blaker 的檢驗結果顯示，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為止，菲華社會凝聚力之強弱與權力施展空間之間的關聯，是十分薄弱的。在其所檢視的西文簿記案、零售業菲化案及商總捐建農村校舍運動這三個案例中，Blaker 發現社群內聚力的強化，並不必然就會使岷里拉中華商會或商總的對外權力增加。反之，團結一致的景象似乎還間接導致了菲華對決策影響力的降低——團結一方面固有利於社群資源之動員集中，另一方面卻也往往重新催動了排華情緒的高漲。此外，Blaker 同時也發現菲華社群團結與否與社群對中國的向心力及民族主義情緒，亦無明顯之正面關係。當然 Blaker 也強調真實的情況往往並非如此截然分明，但認為大部份岷里拉中華商會、商總領導人對中國的忠誠表白與對中國政情的關心，不過為謀在其社群內部取得權威。

Blaker 對菲華社會權力結構的分析無疑相當具權威價值。然而就研究進行時的六十年代中期而言，所謂的「菲華領袖」依然只是侷限於一小撮大陸來菲的第一及第二代華人，惟菲華社會接下來的急遽變遷（尤其是在集體入籍與中〔共〕菲建交後）與認同分化是否將使強有力的中心領導不再如此地被迫需要，值得吾人進一步加以補充。這一點張素玉後來即有處理。此外，Blaker 將國民黨與駐菲領事／大使館在當地影響力的強弱視為菲華社會親中趨勢的重要指標亦不無危險，如此一來難免忽視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為其本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排斥、疏遠國民黨，並不就意味著排斥、疏遠「中國」；何況左、右的意識形態之辨，也使內部分化愈趨複雜——譬如中華民國駐菲大使館在某些人眼中不過是國民黨的另一分支機構，並不代表「中國」。這種忽略，主要應與 Blaker 無法很好地消化中文資料、以及無法突破受訪者心防而探得更多內幕情報有關。

張素玉 1995 年才新近完成的博士專論，基本上可以視為是在 Blaker 論文基礎上構築、廣續的進一步研究。張女士首先指出，商總領導層多年來所扮演的維護菲華社群利益，與作為菲政府推行關係菲華利害政策之中介機構的雙重角色，其實仍近似殖民時代在許多海華社群都曾出現過的「甲必丹」(Capitan) 制度設計。這種眾人的領導期許與商總草創初期的惡劣外在環境有關，而此後廿年間菲

¹³ 這裡所謂之「壯大」，指的是商會或商總領導層對於社群內部各種建制發揮的強大影響力，以及調和衝突、代表社群利益對外發言的地位。

律賓狹隘民族主義者持續於政、經諸領域上的咄咄逼人，則使商總的權力與影響力獲得提升。然而 1975 年馬可仕總統的開放集體入籍與中（菲）建交，卻使商總的力量及威望遭到打擊。此不僅因菲華年輕一代政治融合的過程獲得啟動而得以跳脫「間接」政治參與之侷限，亦由於商總長期以來與台北及國民黨間的密切關係。所以除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等新型政治性團體的出現動搖了其單一發言人的崇高地位外，親北京組織紛起挑戰其領導，也應考慮到。無論如何，1975~1986 年戒嚴法歲月下有限的新聞自由與政團活動空間，仍使商總大致得以維持了其代表菲華對官方發言的地位。然而迨 1987 年始，大勢所趨之下，商總則已明顯流失對於菲華社會整體的掌控能力。至於商總的未來，張素玉則認為其力量將取決於是否能扮演好整合性質的華社「團結者」的角色——易言之，不再是最高领航人——的角色。

張女士對商總的析論無疑是繼 Blaker 以來最詳盡的，惟似乎在重視商總與對外在環境的互動之餘，對其內部甚至菲華社會內部錯綜的派系與利益集團恩怨，著墨過少。菲華社會的內部分化，不僅只侷限於政治方向與認同（親北京、親台北或本土政治認同）的歧異上，這些糾結對商總多年來的生命歷程將構成何種影響，是我們未來希望加以注意到的。

二、本文重點

如前所述，本研究基本上將商總的興衰演進，視為觀察菲華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一環。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華人社會相較，菲華社會固仍有其典型的一面，另一方面卻也頗具獨特性，這是首先必須一提的應有認識。由於歷史環境稍異，早期菲華的移民背景與東南亞的其他地區大不相同，換句話說，其移民主體自始就非由純粹提供勞力的「勞工」所組成。當十九世紀下半葉及廿世紀初中國移民浪潮澎湃之際，前往東南亞謀生的中國流動人口多以苦力身份進入英人治下的星馬、婆羅洲或荷屬東印度群島各地，但卻往往礙於西、美殖民政權移民法令與其他因素的限制，而無法以同樣身份大量湧入距離華南沿海更近的菲律賓群島。這項差異對於菲華後來相對獨特的社會發展影響深遠：不僅造就它在該地區相對與絕對數量上都偏低的華裔人口，也基本決定了菲華社會的職業結構。直到如今，菲華社會大致仍維持了其商業化的特質與活力，從事工商及管理行業者的人口比例之高，恐仍遠居東南亞諸華人社會之冠。而與此或許相關的另一現象，則是資本的普遍寬裕：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整體而言菲華仍屬東南亞華人之首富。據日本海華研究學者游仲勛的推估統計，1972 年時菲華人均收入高達 1,329 美元，而同時期的印尼華人不過 385 美元，南越華人 719 美元（1971 年），西馬華人則僅 239 美元（1968 年）；至於新加坡華人的收入，游氏雖未能提供具體估算數字，但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來看，新華當時顯然還是遜於菲華（游仲勛 1987：140）。以上兩點無疑昭示商人、企業家或所謂的中產階級構成菲華社